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3.002

幸福的温度

——评何顿新作《幸福街》

刘虹利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顿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给个人心灵带来冲击的小说,这些在场感强烈的作品是何顿对时代、对人性的观察。在其新作《幸福街》中,何顿由现场转向历史,通过叙写黄家镇幸福街上两代人、半世纪的生活历程,从源头梳理“50后”的一代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和精神难题,以具有历史感的眼光探寻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中的剧变与恒常,重建了他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和历史判断的整体性。

关键词: 《幸福街》;现实主义;在场感;历史眼光;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3-0006-06

引用格式: 刘虹利.幸福的温度:评何顿新作《幸福街》[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3):6-11.

Temperature of Happiness: A Review of He Dun's New Novel *Happiness Street*

LIU Hong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He Dun has created a series of novels that show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individual hearts. These work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are He Dun's observation of the times and human nature. In his new novel *Happiness Street*, He Dun changes from the scene to the history and combs the life track and spiritual difficul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orn in 1950s from the source by narrating the life course of two generations and half a century on *Happiness Street* in Huangjia Town. It explores the upheaval and constancy in social history and personal life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constructs the integrity of his realistic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judgment.

Keywords: *Happiness Street*; realism; sense of prese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grity

何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个有醒目标签的作家,是“晚生代”或“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新世纪以来,当从现实回溯历史,以《湖南骡子》

《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的“抗战三部曲”将湖南(实际上也可以表征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进行贯通讲述之后,此前的标签便纷纷失效了。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刘虹利(1983—),女,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影视编剧。

在历史隧道里的掘进，使他打量现实的眼光具备了纵深感，他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和鸿富的新阶段。在新世纪头 20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新作《幸福街》以对当代湖南市民生活的整体性书写，创造了更为浑厚、更富层次感的意义空间，传递出有温度、暖人心的文学力量。

少年不识愁滋味 《幸福街》的开篇平整熨贴，以心平气和的语调展开不疾不徐的叙事，“幸福街原先叫吕家巷，一九五一年新政权给街巷钉门牌号时，将它改名为幸福街。”^[1]一条街的命名寄寓了新政权和新社会对人民生活的美好设想，那么，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幸福生活会随着命名而来吗？

为了叩问和探寻幸福的密码，何顿回到原点，擦亮旧时光，让一代人的童年生活逐渐亮起来。在以幸福街为核心的几条浓荫蔽日、花果飘香、生机盎然的街上，几个生于 1958 年的天真孩童翩然登场，黄国辉、何勇、林阿亚、张小山、黄国进、杨琼……他们似乎说笑着从青石板路上向我们走来。与此同时，他们上一辈的父母叔伯婶娘邻居们——如李咏梅、何天民、周兰、林志华、赵春花、黄迎春等人物也在同一空间里活动起来。

《幸福街》写幸福街（黄家镇）生活的全景和市民生活的群像，作家的笔致丝毫不觉滞重粘连。小说开篇细腻洗练、运笔自如，空间自由地在街巷人家转移，镜头流畅地在两代面孔中切换。何顿细致织就湖南市民社会的《清明上河图》，这幅跨度半个世纪的长卷必然人物众多、线索纷纭，因此他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以叙事视点的自在跳跃和腾挪变化，结构出整部小说形散神聚的云卷云舒。叙事中，每一章重点围绕一位主人公展开，藤蔓一般交替缠绕地推进、互为呼应，使每一个人物的形象性格都获得了充分的生长空间；小标题则以每章正文中最恰当的一个句子来作提点，长短不论，宛若藤蔓孳生的触须，显得灵动飘逸。

何顿说自己的文学野心是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员，使后世读者能够通过《幸福街》窥见当时湖南人真实生动的生活。为此，何顿直奔源头，从一代人的童年着笔、娓娓道来。“人之初，性本善”，稚子之美使他的内心多了一份柔情，笔触少了粗砺和直白，叙事节奏多了诗意和流连。在故事的一开始，他把孩童放回到孩童的世界，

玩油板、斗蚰蚴、看杀狗、做藕煤……孩童间的友谊有玩耍、陪伴，也有嫉妒和竞争；有简单的快乐，有淡淡的忧愁。何顿分寸到位，写得生动妥帖。如何勇、黄国辉、林阿亚、张小山在大米厂的老糠房乐此不疲地玩“英勇就义”游戏，“像爬山一样爬到老糠的顶端，然后学电影里即将英勇就义的人样大叫一声‘共产党万岁’，就纵身一跳，顺着堆积的老糠形成的陡坡往下滚，直滚到最下面。接着又一身老糠地往上爬，爬上去又大叫一声‘共产党万岁’，又一跳，又七滚八滚地滚下来。”^[1]这种玩耍的方式实在是烙着深刻的时代印记，但其中被强调、被放大的却是童年的快乐和游戏的愉悦。

富有趣味的是，在这样的简单场景中何顿还写出了青梅竹马的温馨。“何勇一身老糠地看着同样一身老糠的林阿亚说：‘几好玩啊’。林阿亚用悦耳的声音答：‘真好玩。’张小山笑，边拍着头发里的老糠。黄国辉结巴道：‘何勇，明天还来玩玩不？’何勇不答。林阿亚边拍打着衣服上的老糠，边说：‘我要来玩。’何勇答：‘明天来玩。’”^[1]恰到好处的白描手法将几个人之间的关系轻轻点出。

如此的精彩片段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小伙伴几次到湘江游泳的经过就写得起伏有致：第一次是小学一年级，林阿亚学游泳险些被淹死，几个男孩子拼命救人。第二次是小学毕业的夏天，几个人再游湘江，林阿亚、杨琼已是少女初长成，男孩子也都情窦初开；从夕阳西下到新月如钩，几个人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最后林阿亚哼起了《我的祖国》，何勇情不自禁地唱和并展开了对幸福生活的幻想，“边盯着林阿亚的两只白净好看的、拍打着水面的脚，想等他长大了，他一定要跟林阿亚结婚。”^[1]第三次游泳是上高中以后，黄国辉向林阿亚表白遭到拒绝，张小山为了杨琼大病一场。何勇他们几个再一次来到湘江边上，比赛畅游湘江；三个人少年心性，都要争第一。由此观之，何顿写童年的天真烂漫、写青春的微妙萌动，从情绪到语言，都远比写欲望无边、浊浪滔天的成人世界要节制和清新得多。

另一方面，从大跃进到“文革”，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何种喧嚣沸腾自不待言，而围绕何勇、黄国辉这几个人物，何顿则将时代巨轮的轰鸣声

做了淡化处理。实际上,当几个小伙伴享受着不用读书、不用写作业的神仙日子时,上一代人和同代人中的较年长者正在承受命运的重击:赵春花死了丈夫,提心吊胆、苦心孤诣地保护女儿陈漫秋;林志华和母亲被作为特务关进监狱;周兰遭受权势带来的欺凌;区长黄迎春倒台,只能干打扫食堂和出垃圾的活;同代人中,高荷花和陈兵的生活在多次流产中逐渐磨灭着希望;黄琳既体味着苦涩的地位落差,又在小农场与高晓华陷入迷途。何勇、黄国辉等人一方面客观上年纪小,卷入时代的程度较轻,另一方面则是作家给予了他们善意呵护。当张小山和小伙伴在街上快活地游荡时,突然看到自己的父亲正在被人批斗,他当然震惊、伤心甚至恐惧,但经过同伴和母亲的劝慰,张小山便放下心来,心思转移到了第二天一早去练武的约定上了。可以说,何顿是以童真来部分地化解了时代的苦涩、收缩了生活的阴影面积。同时,他也不刻意抹灭恶劣生态中尚存的善意空间:林阿亚领到父亲的骨灰后,悲伤之中在一处草地上腿一软将骨灰弄撒了,她“边蹲在草地上捧起撒落的骨灰往坛子里放,边哭道:‘爸爸呀我的爸爸呀……’”^[1145]此时情状分外凄惨,幸好有何勇全程默默陪伴。林阿亚亲人遭难之后,李咏梅为她打气,帮她争取读初中的权利。陈漫秋前有音乐老师欣赏,成了扮演阿庆嫂的红人;后有居委会刘主任的照顾。她的身份问题使她不能读高中、不能招工,但她自己在书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恢复高考后,湘江旅社的老黄经理不但没批评阻挠,反而支持她和黄国进复习备考。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总有人性的温暖作为底色。这不是对超稳定民间文化结构的探索,也不同于舔舐伤痕进行控诉或在苦难中揭露反思,更与新历史叙事中放大的人性之恶大相径庭,这是何顿20年沉淀之后对生活本相最为平实的表达,是幸福街孕育幸福生活的温暖土壤。

风飘万点正愁人 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有一首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插曲,其中唱道:“小小少年,很少烦恼……随着年岁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尽管作家善意地悬置和延迟时代对青少年的挤压,但这种挤压终究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比神仙还好过的日子总是要结束的,他们的人生之路开始朝不同的方向延

伸分岔,这也接续起了何顿此前在“新现实主义”创作中反复表达的文学主题。

贴着“晚生代”标签的何顿最擅长直接拥抱生气勃勃的市井生活,擅长对社会转型中蓬勃的物欲和情欲画鬼写妖、描形摹态。《我们像葵花》写太阳陨落之后,曾经像葵花一样的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等青年的无所适从,他们要么随波逐流大发其财、精神空虚,要么身无长技、好勇斗狠、害人害己。一代人在物质空前繁荣的时候,走向精神幻灭;他们被时代浪潮裹挟,最终遭到无情抛弃。《我们像野兽》通过黄中林等八个“的的确确的混蛋”的事迹,来写一代大学生的浮世传奇和他们从理想主义走向沉沦的灰色发迹史。何顿观察现实的方式是置身其中,与自己的人物一起在时代的洪流中赤膊上阵,所以他的写作具备强烈的在场感。“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他将一段段身不由己、颠沛浮沉的故事和洪水退去后的一地狼藉表现得格外真实。正如陈晓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概括:“他是如此认真地写出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如此老实实在地回到他的生活事实。这才有他的直接还原生活现场的叙事,对个体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面目不加任何修饰的刻画。这使何顿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中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2168]

陈晓明认为何顿的叙事“是一种平面化的生活现实,一种无法拒绝的存在,又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见证”^[2171]。就何顿的文学野心来说,他应该不会满足于对“平面化的生活现实”的如实呈现。他写过一部《物欲动物》来表现一个富二代的堕落史。小说上篇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篇是主人公第一人称自叙,外篇则由“作者何顿”亲自讲述。在上、下篇中,主人公刘汉林是一个笼罩在父亲巨大成功阴影下的“多余人”,他对金钱与感情的态度与流俗看法格格不入,他曾经祈祷不要生在这个没有信仰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世界。他被女友抛弃后一直过着物质丰盈但精神苍白的生活,直到他爱上了父亲情人的侄女张红,才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不顾阻挠,奋力追求爱情并且成功地与张红结婚生子。这一切的确是滚滚浊浪中的涓涓清流,但随之展开的外篇打破了这一幻象,叙事人“何顿”让我们得知刘汉林并非贾府门前的石狮子。新婚才一年多,他就再次

假爱情之名与电视台的欧阳小姐建立了情人关系，后者同时是另一个大款的情人。刘汉林在情感上对张红始乱终弃，在生活态度上认同了马副董等人的论调。电视台的美女最终也不能满足刘汉林猎艳的欲望，他成了父亲和马副董等人中的一员，从形单影只的多余人变成了与他父亲同流合污之人。

小说中，何顿借刘汉林之口谈到了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毕巧林是一位丧失了精神目标的上流社会贵族青年，他在厌倦中游戏人生，又在游戏人生中陷入更深的厌倦。毕巧林曾扪心自问：“我活着为了什么？生有什么抱负？啊，抱负想必曾经有过，而且上苍所赋使命想必也很崇高，因为在自己心里，我感到了我身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无穷力量……然而我却并没有领悟这一使命，我一味沉湎于各种无聊而下流的欲望的诱惑之中；当我从它们的熔炉里出来时，已变得又硬又冷，如同一块生铁，而高尚志趣的火焰——风华正茂的岁月，却已付诸东流，永不复返。”^{[3]137}在叙事上，莱蒙托夫通过叙事者和叙事视角的转换，以拼图的方式展现出毕巧林的离奇经历和复杂内心。对比之下，《物欲动物》的上下篇加外篇的结构模式的确有向《当代英雄》致敬的意味，而刘汉林及冯建军、李跃进、张逊、黄中林等许多丧失了精神纬度的主人公也都与毕巧林有几分神似。

毕巧林认为自己的“躯体中有并存的两个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的含意，另一个则在思考、判断着这个人；第一个可能一小时后就要与您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呢？”^{[3]140}也许承担审判任务的第二个人就存在于他的日记之中，这些自省文字不仅让他获得完整的生活意义，还作为肉身的替代物使他再活一次。

对何顿而言，他写作中也同样有“并存的两个人”。一方面，他以“新现实主义”的方式不隐恶不专美，以最原始的风貌写出第一层面的“生活着的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则担任起审判的任务，持续地思考判断着这些人物，并对他们的生死来去做出了断。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正常死亡：《我不想事》中的柚子被双管猎枪打死；《我们像野兽》中已经奋斗成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黄中林开着宾利深夜和情人约会，被杀死在河堤

下；《黄泥街》的张逊做书生意做成了千万富翁，却因在高速路上疲劳驾驶横死于车祸之中（《黄泥街》也是以第三人称讲述张逊的发迹史，同时以他的日记为补充材料，形成内外视角之间的张力，让人更深地走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还有，《时代英雄》里的罗定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虽然没死，但是他的情人小王局长却横死了。罗定将小王局长的骨灰带到珠峰埋葬，满足了她生前的愿望。在罗定将《存在与时间》和《婚姻与道德》顺手塞进垃圾袋的时候，他那曾对物欲刺激不为所动的精神世界似乎永远消散了。

“有人问他，你的小说里怎么老是有死亡？何顿回答的神色有些黯然：‘这一代人既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在学校里又无教育可受，他们成了时代的弃儿，其中一些人活在世上和野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是我叫他们死，是那个年代酿成了他们死亡的必然结局。我没办法，其实我愿意他们很快活高尚地活着。’^[4]虽然何顿说这是生活逻辑使然，但在我看来，也许真相恰好相反。何顿一方面真实地书写着人物热气腾腾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在他们前方安排下死亡的陷阱，这不是现实逻辑或性格推衍的必然结果，而是基于作家对时代的理解和态度。他深知精神受损、先天不足的一代人走入物质喧嚣中的危险性，很大的可能是他们会堕落为行尸走肉。但何顿作为作者无从拔升他们的精神境界，无力阻止他们滑向深渊，更无法在现实中为他们探寻到生活远景，便索性让他们一死了之。此中表达出的是何顿自己对人物生活态度的不认同，甚至是对当下和未来无从判断的躁动和迷茫。这颇似司马相如的“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因此常常给一些读者留下何顿放弃批判、迎合时代的印象。

当然，何顿文本中的人物并非完全没有自我评判。罗定说自己“成了饮酒作乐之徒。什么人改变了我？让我变成这样？是这个改变人的社会，人一掉进社会这只大染缸，再好的人也会变坏，我所接触的人，没一个有信仰，人无怕惧。昨天，甚至是最好的朋友，也可以在金钱和利益面前翻脸，所以人活在这个空气如此肮脏的社会，想成为一个好人，很难”^[5]。然而，这是造就一代人命运轨迹的唯一原因吗？又或者所有人都必然如

此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当何顿穷形尽相地写尽了现象界的浮世绘,便必然要去探寻缘由,为物寻找出路,“小说不能直抒胸臆,谴责社会,却可以把把社会的脉。”^[6]

在《幸福街》中,何顿从头开始细致梳理一代人的精神症候和心理症状。童年时代的天真未泯松弛了他的神经,舒缓了他的叙事节奏,他以同情之理解来提笔写作的时候,便发现了个人生活中的剧变与恒常。张小山、黄国辉、杨琼、黄琳、高晓华……年少时的他们何尝不是良材璞玉!黄国辉拾金不昧,还与张小山舍己救人;张小山追求上进,曾一脸庄重地“向毛主席保证”“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还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杨琼是班长,学业和生活态度自然积极向上;黄琳是富有优越感的高干子弟;高晓华则对时代理想最为坚信不疑。《幸福街》紧贴人物命运,将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转捩点一一指出,让读者为他们在生活面前的步步溃退惋惜不已。即便如此,当他们被时代损害和抛弃的时候,依然没有失掉人性最基本的良善:杨琼沦为暗娼,张小山和黄国辉加以接济;黄国辉为了朋友义气放走被拘的张小山,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张小山聪明所以能做坏事,却不是大奸大恶之徒;黄国辉头脑简单但忠于职守,“若在古代,肯定是要流芳百世的。”^{[1]497}

何顿怀着宽容写他们一塌糊涂的生活,多了温情,少了愤世。与此同时,何顿反映生活的视域也更为宽广,同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并不“都是一些调皮捣蛋的角色”,不是每个人都“坐的坐牢死的死”^[7]。黄国辉几人去小树林练拳的时候,黄国进遵父命乖乖在家练毛笔字;区长黄迎春虽然落难,却受到赵春花一如既往的善待;陈漫秋岁月蹉跎,但懂得在书籍中充实自己;何勇挚爱林阿亚,却能够大度成全她的爱情;林阿亚陷入卑微的绝境,却越发自强自爱——在她和何勇的恋情中很难说没有掺杂一点自私和利用,但作家仅是一掠而过并未点破,这是承担评判任务的“第二个人”对人物善意。人物命运的对比使读者在感慨之余对人的能动性重建信心,并领会到总有一些东西是生活中值得坚持的,这是因为,个体的人虽受制于社会,但也正是个体的人构成了我们赖以存在的社会。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何顿曾经认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不可能始终都是全面的:“局部的相对面是整体。整体是局部的累积或者是局部的延续。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一个相对的整体,一个小时是一天的局部。一天又是一个月的局部,一个月则是一年的局部。一切都是相对的。事物都有两个面,一面是整体,一面是局部。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局部中。人是集体中的局部,但人的一生是一个整体,然而你经历的每一天却是一个局部,是你一生中一块碎片。你每天都是生活在碎片中。整体是大脑给你的一种概念,一种认识,它只是理念上的。你看到的绝对都是局部。……人是生活在局部中,生活在一块块的碎片中,整体是看不到的。”^[8]何顿写过很多“局部”,但当他回溯历史,建构起“抗战三部曲”的宏伟篇章时,证明他表现整体的能力同样非常出色。《湖南骡子》写出了五世同堂的家族所经历的逾百年的风雨沧桑;《来生再见》写90岁的黄抗日半生戎马倥偬、出生入死;《黄埔四期》里的谢乃常从去县城买葱油饼出发,出走半世归来已是耄耋。三部作品为一代无名者正名、向即将隐匿者作别,既打通历史,又勾连当下。天若有情天亦老,百年来社会历史从未停止演化,而一代代人只有肩起命运的重压,负重前行,这样才会离渴求的幸福越来越近。也许人类从诞生以来,便一直行进在这条求索之路上,虽从未一帆风顺,但也从未止步不前。这使何顿打量现实生活的眼光更具历史感。

在《幸福街》中,何顿重建了对当代市民生活的整体性书写,线索清晰地勾画了两代人不同的命运轨迹——他们中既有被判死刑受枪决而死的,也有奋斗不息于社会有益的;既有家庭破碎一地鸡毛的,也有晚境甜蜜白头到老的;既有坚守本心服务桑梓的,也有远走高飞海阔天空的。何顿还将过去诸多局部性文本中的人物泥人一般捏碎了重塑,赋予他们更为立体的性格:《时代英雄》里罗定有个副厅级的同学,这个人走进《幸福街》很可能就是主角之一黄国进。《我们像野兽》中残忍杀害黄中林和小情人的正是几个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他们是“刘伢子邓伢子许伢子”,他们年少时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鄙视读书、纵情玩耍,很快便受到

生活报复，被打入社会最底层，成为了铤而走险、锒铛入狱的抢劫杀人犯，他们是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的低配版。在《幸福街》里，其个人史丰厚整全起来，他们就成了张小山、黄国辉或者二毛、王进和刘兴，成了令人唏嘘慨叹的圆型人物，成了何顿的《清明上河图》中不可磨灭的精彩笔致。

正如张旭东所说，“对‘现在’和‘未来’的界定其实就决定着我们对‘历史’的叙述。……换言之，回顾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经验，虽然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很大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不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以一种抽象的关于‘人’、‘自由’、‘个体性’以及世俗生活‘常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去取代历史的严格的分析，其结果就会导致中国对自身生活和‘现代性’经验的理解流于片断化或局部化。”^[9]也就是说，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从来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有对当下有理性的认知，才能打捞出历史信息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也只有基于对历史的深入解读，才能对现在作出公允的评判，对未来进行合理的憧憬。《湖南骡子》中写到了很感人的一幕场景：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李文军以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将军何金山的名义召集老兵聚会。在约定的8月15日这天，200多名七八十岁的老人以各种方式到达聚会地点，他们在利民粉店边吃粉边述旧。在途经的路人眼中，这只是一大群老人坐在利民粉店前叽叽咕咕，并不觉得其中浓缩着怎样的历史沧桑、个人遭际与生死抉择。到最后，他们尽管依依不舍，却也逐个散去，犹如历史本身一般云淡风轻，犹如一个人来这世上走一遭的情形。小说结尾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长沙第一栋十几层的高楼竣工，一群抗战老兵相邀前去观看，久久不肯离去。“他们活着和死去都只有一个心愿——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那就是希望中国富强。”^[10]也许从那时开始，关于“幸福”的概念就已经在何顿的心中形成了。

近期，孟繁华在提及文学的“情义危机”时说：“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

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恶。……文学的价值更在于表达了其他媒体不能或难以表达的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如果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新经验不能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炼出新的可能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以夸大的方式参与‘构成时代氛围’，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当下文学不断遭遇矮化和诟病，文学的不被信任日益扩散和弥漫，这与文学的‘有情’背道而驰是大有关系的。文学如果可以不再关注情义，不再表达人情冷暖，读者要文学何干！如果文学把被讲述的生活描述得惨不忍睹，那么文学还有什么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要警惕文学的情义危机，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11]由此观之，《幸福街》必将以情义的力量、文学的温度为当代中国人追寻幸福提供真实的见证和可贵的心灵范本。

参考文献：

- [1] 何顿. 幸福街[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 [2] 陈晓明. 回到生活现场的叙事：何顿小说简论[J]. 山花，1995(10).
- [3] 莱蒙托夫. 当代英雄[M]. 吕绍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137.
- [4] 曹建泉. 朋友何顿[J]. 散文，1995(11)：155.
- [5] 何顿. 时代英雄[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360-361.
- [6] 何顿，王晓梦. 写作是一种深刻的热爱：何顿访谈录[J]. 百家评论，2015(6)：51.
- [7] 何顿. 物欲动物[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218.
- [8] 何顿. 局部[J]. 南方文坛，1998(2)：32.
- [9] 张旭东. 纽约书简[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30-134.
- [10] 何顿. 湖南骡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26.
- [11] 孟繁华. 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N]. 光明日报，2019-03-27(14).

责任编辑：黄声波